

經濟政治批判：提出一種符合批判 觀點的馬克思主義經濟政治觀

王賀白*

- 一、緒論——經濟政治的一個謎
- 二、經濟的政治理性
- 三、經濟政治的理想
- 四、經濟政治的現實
- 五、政治人類學觀點下的經濟政治
- 六、經濟政治的可能
- 七、結論——符合批判觀點的經濟政治

本文首先提出「經濟政治之謎」作為全文問題意識：也就是，在理論上知道，完美的公共選擇不管由市場決定或由國家決定都不可能達到；然而在實際上，公眾生活中卻無時無刻要進行公共選擇。在以 Mill 為主的「經濟政治理想」和以 Marx 為主的「經濟政治現實」討論中，更清楚地說明了「經濟政治之謎」的緊張性。另外在「政治人類學觀點下的經濟政治」則是一方面提出 Polanyi 的經濟從屬社會的主張，另一方面，則以目前嚴重的南北問題與生態問題說明經濟政治批判的必要。然而，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的批評仍舊是一種經濟政治，只是作為資本主義的對立而存在，這在冷戰結束過程中更可看出。因此，說馬克思主義沒有一套漸進可行的政治經濟學是可以成立的。本文認為，從 Dworkin 的 Law's Empire 書中的「整體性法律」觀點，可以找到彌補馬克思主義這一方面的不足。

這個「整體性法律」告訴我們：「因襲主義」與「實用主義」的公共選擇，只是少數有權有勢的人才會有權決定，是不足取的，而這樣的公共選擇是有害於政治的，因此，在公眾政治的範疇中必須否認這樣的公共選擇；而我們要肯的是那個可以在公眾中推己及人的「整體性」觀點，它指出公共選擇必須由全體人民共同決定。

關鍵字：經濟政治、批判、政治人類學、市場、國家、整體性法律

* 政治大學政治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 本文是撰寫中「政治理性的批判與重建」的一部份，在此感謝郭博文老師與蔡明田老師的指導，以及兩位評審寶貴的意見。

一、緒論——經濟政治的一個謎

歷史上，經濟政治基本上由資產階級所支持，但它也是人們文化心理結構的普遍傾向。人們傾向於以自己的類型、種族文化塑造心中的經濟政治。

在封建時代，公眾事務由少數封建階級所決定，並以「道德」為其統治的合法藉口。但，進入資本主義時代，公眾事務該如何決定、由誰決定，成了新的所謂「公共選擇」¹問題，即個人與公眾之間該如何協調的問題。資產階級認為，公眾事務的「公共選擇」應由市場決定，而多數的中下階級卻希望由其投票選出國家政權出面保護，這兩者都形成所謂的經濟政治。

而在經濟政治理想與經濟政治現實的二律背反中，初次說明了經濟政治的一個謎：那就是，在理論上知道，完美的公共選擇不管由市場決定或由國家決定都不可能達到；然而在實際上，公眾生活中卻無時無刻要進行公共選擇²。

經濟政治批判的主旨在於指出，不管是資產階級的「市場」或是中下階級的「國家」，都是以自己的類型標準塑造公眾的公共選擇，而應予以批判³。本文從政治人類學⁴觀點看經濟政治，並經由I. Kant式的提法，企圖修改並

1. K. J. Arrow的「社會選擇」概念(1963: 92-3)與J. M. Buchanan的「公共選擇」概念(1977: 81-93)都是指個人與社會之間該如何協調。然Buchanan的「公共選擇」是契約論觀點，而Arrow的「社會選擇」是功利主義觀點，因此，本文選擇使用「公共選擇」。不過，本文雖然使用Buchanan的用詞，但並不贊成他單方面以經濟個人主義的立場選擇界定契約(J. Rawls, 1971: 197)，而認為最重要的是，應從公眾整體的立場界定契約，否則契約只成為私人之間的合同罷了。

2. 轉換自Kant在*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中提到的批判哲學的謎：「我們何以否認，在思辨中運用各種範疇於超感性界的客觀實在性；而在純粹實踐理性的對象方面，卻又承認這種實在性」(1956: 5)。

3. 這裡的「批判」(kritik/critique)觀點是指最古典意義上的Kant觀點，與法蘭克福學派(Frankfurt School)所指的批判理論(區分於經驗分析與歷史詮釋)不同。Kant說，他的批判觀點，不是對於各種書籍或體系的批判，而是對於「獨立於經驗去追求知識的理性能力」的一種批判(1929: 9)。

4. 政治人類學是指將人類的政治思想、行為、制度，放在人類整體歷史的過程中來考察，是一種「人類學本體論」(李澤厚, 1986: 103,309)的政治思考。在這思考過程中，筆者提出一「政治人類

發展馬克思主義的經濟政治。

二、經濟的政治理性

我們直覺希望公眾事務能照顧到每一個人的需要，因此，我們自然會希望公眾事務之「公共選擇」能夠完美協調地運作，達成此一目的，這是經濟的政治感性；在這樣的感性之上，我們進一步傾向會歸納出，公眾事務的經濟原則，應是由自由放任的市場或是由國家統制，這是經濟的政治知性；同樣地，感性與知性進一步超越認識界限形成先驗幻相的理性，即認為好的公眾政治的達成，必然是主政者依市場或依國家完成公共選擇，因此，選擇市場或是選擇國家決定著政治的好壞，這是經濟的政治理性⁵。

學式的政治本體演變綱要」。這個綱要認為：人類社會從最初初民社會的「無政治」（non-political）狀態，轉變為市民社會的「非政治」（apolitical）狀態，以迄我們在未來國際社會中所必須發展的「政治的」（political）狀態。

「無政治」狀態是指初民社會時代，因為以血緣為基礎的氏族組織尚未發展出政治社會形態，因此是「無政治」。

「非政治」狀態則是指走出初民社會後，逐漸以地域和財產為基礎的政治組織取代了以血緣為基礎的氏族組織（Morgan, 1964：233-4）。在這狀態中先後產生了道德政治與經濟政治。道德政治認為，理想公眾生活的人是政治道德人，這是一個倫理學主導政治學的時代；經濟政治則認為，理想公眾生活的人是政治經濟人，這是一個經濟學主導政治學的時代。

而所謂的「政治的」狀態是一現在進行式，指出民主政治一開始雖不完美但它才是以政治本體為認識對象的政治學範疇。民主政治認為，理想公眾生活的人是政治「全人」，這將是一個政治學終於可以獨立自主的時代。

5. 以上政治感性、知性與理性的思考推演，是從 Kant 的「感性」（*sinnlichkeit/sensibility*）、「知性」（*verstand/understanding*）、「理性」（*vernunft/reason*）而來。Kant 認為，「感性」是指透過對象影響我們的模式，的一種接受表象的能力（1929：a19=b33），由於感性只是我們的一種感受能力，因此，感性並不是自在之物本身，而只是其表面的現象。「知性」則是一種根據感性所提供的現象予以判斷的思維能力，一種通過規則，把現象統一起來的一種能力（1929：a302=b359），然而，知性的範疇概念由於僅僅使用在經驗上，因此，不能超越使用於經驗對象之外。而「理性」在這裡則不是指廣義的人類理解能力，而是 Kant 所指的比知性更高一層的認識階段：知性指的是經驗以內的認識，而理性則是經驗以外、無法證實的認識，如靈魂不滅、世界整體、上帝存在等。由於理性認識的對象都是超出人的經驗認識範圍之外，因此，它最終只能是一種假定而必須予以批判。

爲了更精確理解經濟政治理性含義，以下除了對「經濟」說文解字外，也將分別對「營利」與「勞動」予以解釋。

經 濟

經濟，以中文的經國濟民解，正表示出中國的經濟詞義，仍籠罩在「道德」的龐大影響中，那個時候的經濟觀是重農抑商，並且從屬於漫天鋪地的道德政治世界中的。而在古希臘，經濟(economics)一詞是從 Aristotle 的「家務管理」(oikonomia)而來，一樣也是從屬於社會中。Aristotle 秉持對良善生活的重視，不贊同經濟物資過量的成長，因此他說理想的「家務管理」是「家務重在人事，不重無生命的財物；重在人生的善德，不重家資的豐饒」(1984：1259b19)，甚至 Aristotle 批評那些永無止境聚斂錢幣的人們，是「他們只知重視生活而不知何者才是優良生活的緣故」(1984：1257b41-1258a1)。

但當資本主義發端於義大利，盛行於歐洲，甚至席捲整個世界時，從屬於社會的經濟卻一躍站在社會之上，成了主控一切的經濟政治。即使是今天，經濟政治仍主導這個世界，金錢不但取得了上帝的地位，商品也有了自己的生命與帝國(S. S. Praver, 1976：321, 345)。

然而即使當 Marx 批評唯商品爲馬首是瞻的拜物教，他也沒有意思要依戀過去的道德政治。相反地，Marx 承認肯定經濟的重要性，他甚至說自由王國只有建立在經濟的必然王國的基礎上，才有自由發展的可能。而 Engels 更明白表示，人類首先必須吃、喝、住、穿，然後才能從事政治、科學、藝術、宗教等等(1975-95, 24：467)，經濟是人們存在的第一基礎。

不過本文認爲，對「經濟」做出最經典區分的是 K. Polanyi。Polanyi 在 The Livelihood of Man 書中認爲，「經濟」有兩個關鍵意義上的區別，分別是「形式上的」(formal)與「實質上的」(substantive)(1977：19)。「形式上的」意義認爲，由於資源的稀少性，因此，「經濟」最重要的是有效地使用有限資源以達到特定目的的過程；而「實質上的」意義則認爲，人和其他動

物一樣，必須有周遭物質環境的支持才能生存，「經濟」就是指這基本的物質供應。

而在人類的經濟歷史中，一向是形式與實質意義並存的，只有到資本主義主控人類歷史後，「實質」意義才漸漸被忽視，僅剩「形式」意義。前面提及古代中國、Aristotle、Marx 與 Engels 對經濟的看法，正是對此一資本主義「形式」經濟意義的抗議。這種喪失「實質」意義的資本主義經濟主張，漸漸主導並形成了近代才有的經濟政治，而它的典範就是「營利」；另一方面，當 Marx 極力提高經濟「實質」意義，甚至走到完全否定「形式」意義時，他同樣扭曲了經濟應有的兩層意義，成為資本主義的對立論述，形成所謂的「勞動」典範。

營 利

如果說，「德性」典範是道德政治的具體縮影，那麼「營利」典範則是經濟政治的具體縮影，它是資本主義的核心精神。而最早從「德性」轉變到「營利」是在歐洲，十八世紀的 Montesquieu，就在其 *The Spirit of the Law* 書中指出，希臘時代的「德性」應該讓位給「營利」（1989：22-3），為以上「德性」轉換到「營利」提出呼籲。

而在二十世紀，政治思想史家 Leo Strauss 與 C. B. Macpherson（馬克弗森）則都共同認為 Hobbes 相對於長期主導政治理論的 Aristotle 是一種替換，而不僅僅是在 Aristotle 論述典範內的轉化（許國賢，1993：39），他們皆從 Hobbes 的研究中，看到了典範的轉變，政治道德人變成政治經濟人。不過在說明轉變過程時，Leo Strauss 與 Macpherson 的立場剛好相反：Leo Strauss 感歎「德性」的不再，希望恢復過去傳統的「德性」社會；而 Macpherson 卻批評 Hobbes，認為 Hobbes 與 Locke 是佔有式個人主義（possessive individualism）的政治理論，Macpherson 希望這樣的典範能轉為「民主」。

然而，本文認為「營利」與「經濟」的含義是有差別的：「經濟」雖是「必然王國」——人類生存的基礎，但它只應在經濟學的領域以內，在

Aristotle 觀念裡，是指運用合乎自然「獲得財產的技術」（1984：1256a10）；而「營利」則是將這「獲得財產的技術」運用到超越人的生存需要，超出經濟學領域之外，成為 Aristotle 所批評的，是一種不合乎自然的「獲得金錢的技術」（1984：1256b40），Williams 說「它在十九世紀時，成為一種將商業利潤置於一切之上的體系」（1976：60），事實上「營利」是把經濟擴大到政治領域，形成所謂的經濟政治。

勞 動

Lenin 曾經形容 Marx 是三種思潮的繼承人與完成者，分別是德國古典哲學、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與法國社會主義。其實更準確地說，Marx 是在英、法「營利」典範的基礎上，進一步將德國古典哲學從天上帶至人間，從而開展出一個新的論述典範——「勞動」。Marx 所代表的聲音是大多數中下階級的聲音，人類有史以來尚沒有人像 Marx 這樣，如此普羅地視「勞動」為至高神聖。

Marx 認為人類勞動在太古時代，就可能已經擺脫最初本能的活動了。他將蜜蜂與建築師比較，認為雖然蜜蜂建築蜂房的本領會使許多建築師汗顏，但是，最蹩腳的建築師從一開始就比最靈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在於，建築師在蓋房子以前，就已經在他的腦中把它蓋成了。而這個腦中簡單形成的房子概念，可能歷經人類數十萬年不斷勞動才形成，最後人類的勞動終於服從於人類心想的目的。而 Engels 與 Lenin 更進一步加強了 Marx 的「勞動」典範：Engels 在其 *Dialectics of Nature* 中提及「勞動在從猿到人轉變過程中的作用」時，重申就是因為「勞動」，人才從其他動物區別出來（1975-95，25：460），勞動創造了人本身。

不過，雖然馬克思主義者說明了「勞動」對人類文明起源的重要，但這並不代表「勞動」在往後歷史中有其不可動搖的本體優先地位，在人類歷史中，反而是「德性」典範的道德政治與「營利」典範的經濟政治主導現實。雖然，現實存在並不一定是合理的，但將「勞動」置於不容置疑的本體優先

地位仍是不宜的。

法國年鑑學派（*Annales*）Braudel，在其三大卷著作 *Civilization & Capitalism 15th-18th Century* 的最後一卷「世界觀點」結論中指出「形形色色的資本主義與市場經濟之間存在著毋庸置疑的區別」（1984：628）。在Braudel看來，資本主義的「營利」金錢遊戲與市場經濟的「經濟」必然王國，是看似類似，但實質上卻是不同文明的區別。

今天，資本主義國家與社會主義國家就是混淆了這個區別，遂造成嚴重後果：資本主義國家極力升高「營利」的重要，造成貧富嚴重不均；而社會主義國家則相反地壓制了「經濟」應有的正常發展，以致造成生產水平萎縮。可以說，前者是喪失「實質」經濟意義的「營利」典範所造成的後果，後者則是喪失「形式」經濟意義的「勞動」典範所造成的後果。如何回歸 Polanyi 所主張的，兼具「形式」與「實質」雙重的經濟意義，是當前經濟政治的迫切課題。

三、經濟政治的理想

區分經濟政治理想，本文認為有「市場」與「國家」兩種：「市場」強調自由放任對社會整體最大利益的重要，每個人皆從自利出發，市場就會像一隻看不見的手⁶和諧運作，達到每個人所想要的目標，政府的目的是在於確保市場機制得以順暢運行，這個立場以市民社會排除了國家積極存在的正面功能，經濟自由主義可為代表；而「國家」的正義觀，則強調國家存在對整個社會的穩定功能，在資本主義興起之前，專制封建的國家固不足取，但資本主義弊病叢生之後，由多數人民同意的憲政國家，又重新獲得積極存在的理由，政治自由主義可為代表。

6. Smith 在倫理學著作 *The Moral Sentiment* 中，將「看不見的手」（1948：215）引申到經濟學著作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中，這隻「看不見的手」，指引各個人追求各自利益，有效地促成、加總成社會整體的利益（1976, I：477-8）。

討論「經濟政治理想」，本章認為，J. S. Mill學說有其中間樞紐位置，L. T. Hobhouse說他「處於舊的與新的自由主義區間之中」（1964：58），而G. H. Sabine也認為「自由主義可分為兩個階段，…，而分界點可以Mill來劃分，因為他的哲學巧妙地站在這兩個端點上」（1973：612）⁷。

經濟自由主義

經濟自由主義可說是十八世紀啓蒙理性主義時代，將自然科學的樂觀圖像想像到眾人事務的公共選擇上。不管是J. Bentham功利主義的快樂與痛苦的「倫理計算法」，或者是Adam Smith自由放任的市場。

過去公眾選擇由專制統治者決定，在近代則展現在重商主義與重農主義上，不過，不管是重商或重農，其決定權仍然指向由專制的統治者決定。自由放任的市場即是新興資產階級想出來用以取代以上專制任意的決定。因此，資產階級所認定的「經濟學之父」，不會是重商主義的代表人物Thomas Mun或是重農主義的代表人物Francois Quesnay，而是Adam Smith。

1. 古典的供給面理論

Smith是最早力倡自由貿易論，並以此反對重商主義與重農主義。他認為不管是重商或重農皆會樹立不自然的貿易障礙，妨礙那看不見的手創造人類的最大福祉。Smith這種強調自由貿易理論，並不僅限於一國之內，他說：「如外國能供給一種比我們自己生產還便宜的商品，那就最好將我們的產業用於我們擅長的方面，以擅長生產的一部份去購買那種外國便宜商品」

7. Sabine認為兩個階段的自由主義分別為古典觀的自由主義（the classical version of liberalism）與修正現代化的自由主義（revision and modernization of liberalism）。本文則將「古典觀的自由主義」轉換為「經濟自由主義」，理由是質疑國家角色的觀念，最早是從資產階級質疑封建階級（原本通常是他們控制國家）的經濟特權而來，資產階級首先要求經濟自由，到後來才演申到其他言論自由等層面；另外，將「修正現代化的自由主義」轉換為「政治自由主義」，理由則是重新肯定國家角色的觀念，是了解到必須以國家的政治公權力，化解因經濟而產生的問題。「經濟自由主義」一詞來自Polanyi的The Great Transformation書中的概念（1957：135）；而「政治自由主義」則在Rawls的Political Liberalism一書出版後，更為確定。

(1976, I: 478-9)。

Smith 的國貿主張被稱為「絕對利益說」，即認為一國若能比他國生產出較多的某一商品來，即稱該國對這種商品之生產具有絕對利益或絕對優勢。這樣的「絕對利益說」，後來為 David Ricardo 的「比較利益說」取代。比較利益說認為，即使一國不具任何絕對利益，但她仍可選擇利益相對較高或劣勢相對較小的商品予以生產出口，因此國際間的自由貿易仍應積極推動 (1912: 77-93)。

2. 需求面的邊際效用理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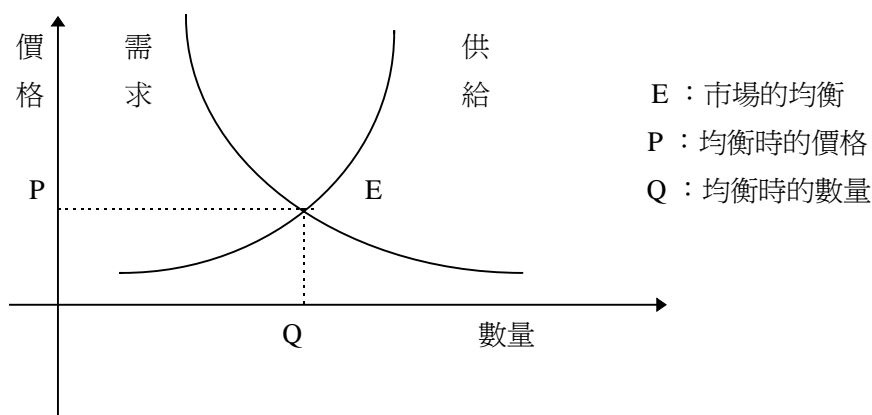
鼓吹自由貿易理論在 Smith 與 Ricardo 的著作中，多從生產者廠商供給面觀點出發；而從消費者需求面觀點出發的是「邊際效用理論」，一般認為是由英國的 W. S. Jevons、奧地利的 Carl Menger 與法國的 Leon Walras 大致在同一時間不謀而合地各自創建起來。

「邊際效用理論」解決了困擾經濟學家們多年的，所謂鑽石與水的價值與效用矛盾問題。這個矛盾是：就效用而言，人不能一天沒有水，但卻可以沒有鑽石；但就價值來說，鑽石遠比水價值高。

邊際效用理論的「邊際效用遞減法則」則為我們解釋了這個矛盾：水的需求雖大，但因供給更多，因此需求者的邊際效用遞減結果，造成價格偏低；而鑽石的用途雖比不上水，需求不大，但因供給非常少，因此需求者邊際效用非常高的結果，造成價格偏高。

3. Alfred Marshall 的市場均衡新古典理論

如果說，Smith「看不見的手」的市場仍是一樂觀想像，那麼，Marshall 剪刀般的市場均衡則是融合前面供給面與需求面，進而勾畫出一幅更清楚的圖像。因此，他的理論被稱為新古典理論。他認為決定價值的價格，是由供給面的「生產成本」與需求面的「效用」共同決定，而決定的結果就是市場的均衡「價格」與「量」，如下圖：



Marshall 認為，無論是供給或需求的「量」，當任何一方發生改變，均會使產品的「價格」發生改變，而產品價格改變的結果，又會使供給或需求的量發生改變，直到市場達到均衡，量與價格不再變動為止（1961：345-7）。

經濟自由主義發展到 Marshall 這裡，似乎認為社會活動除了由市場機能自動調節外，沒有國家存在的必要。而我們也注意到在 Smith、Ricardo、T. R. Malthus 以至 Mill 以來的「政治經濟學」傳統，到 Marshall 這裡只剩「經濟學」了⁸。

政治自由主義

然而，今天的經濟自由主義者可能沒有想到，他們心中崇尚市場萬能的「經濟學之父」Smith，其實是十九世紀經濟學家塑造的，並非本來面目。前面曾經提到，Smith 反對國家干預，但在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8. Smith 的著作全名為《諸國民之富的性質及原因探究》，Ricardo 為《政治經濟學原理與賦稅》，Malthus 為《政治經濟學原理》，Mill 為《政治經濟學原理及其對社會哲學的若干應用》，但從 Marshall 開始的相關著作，只有《經濟學原理》，「政治的」此一形容詞被取消了。甚至在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的「經濟學名著翻譯叢書」中，Ricardo、Malthus、與 Mill 的著作，「政治的」也都被略去了。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中，他僅將此觀念限於經濟事務，而在非經濟事務方面，則完全相反，甚至可說是主張要有大有為政府，主權者應盡許多義務（1976, II：208-9）。

但更令經濟學家們震撼的應是，1896 年才出版的Smith原著Lectures on Justice, Police, Revenue and Arms。在這著作中，Smith更明確地說明他所理解政府形態的演變，他認為，由市民社會組成的政府有權威與功利兩原理，前者是君主專制的，後者是民主共和的。Smith認為最早的社會是功利原理的民主共和政府，但後來卻被君主專制取代（1896：26）。因此我們可以如此推論說，Smith心中理想的「市場」是與這裡所說的民主共和政府協調的，市場所要反對的政府是君主式的，而並非反對任何政府存在，尤其不可能反對民主共和政府。所以當Hayek等經濟自由主義者將「市場」擴大到反對任何積極作為的民主共和政府時，他們事實上嚴重誤解了Smith的原意。

而身處十九世紀中葉的Mill，已經深刻感受到當時經濟自由主義崇尚市場萬能，造成社會貧富不均的惡果。因此，他在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書中，更清楚地說出政府必須有「必然的功能」（1965：799-800）。同時，他了解經濟自由主義所擔心的，過去貴族寡頭政府所控制的國家，因此，在其Considerations on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著作中，強調執行「必然功能」的政府必須是代議政府，且在書中談及如何選舉、投票等。不過，正如Marshall只談經濟學原理，作為資產階級代言人的大部份經濟學家們刻意排除Smith與Mill有關政治方面的教導，直到1929年經濟大恐慌才真正震撼了經濟學家們的市場美夢。

1933年美國E. H. Chamberlin的The Theory of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與英國J. Robinson的The Economics of Imperfect Competition，不約而同地提出過去經濟理論忽略了壟斷勢力的存在和對壟斷缺乏分析的缺點。這些看法一方面對過去古典（或新古典）經濟理論進行攻擊，一方面則嘗試解釋經濟大恐慌的原因。

不過真正達成上述目的是J. M. Keynes。1926年Keynes發表「自由放

任主義的終結」一文，即已在否定過去經濟自由主義的基本命題——私人利益與社會利益可以一致的看法。文中主張一國的經濟活動，應規定哪些歸政府管，哪些歸私人（股份形式的私營企業），他認為那些私人已在進行而有成就的，政府就不必再過問，政府應該過問的是那些在私人活動以外的事業。Keynes的觀點表明，他開始傾向由「國家」出面來調節經濟，企圖透過政權的力量，解決資本主義內在的矛盾（羅志如（等著），1993：105）。1935年出版的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Keynes進一步顛覆了Marshall的古典經濟理論，是為所謂的「Keynes革命」。

Keynes認為，供給與需求常常不會自動均衡而且時常出現供過於求，經濟上的常態不是充分就業，因此政府必須出面，適時人為提昇「有效需求」，達到社會整體期待的經濟目標（1973：23）。政府可以做的有效政策是，透過赤字的財政政策，提高整個社會的有效需求，如此才能走出蕭條的谷底。值得注意的是，當時美國總統 F. D. Roosevelt 的「新政」即是完全照 Keynes 的想法實施的。

不過我們必須注意，Keynes 的總體經濟政策雖然強調政府干預市場，但基本上仍是以市場運作為主軸，只有當市場有缺陷時（如經濟大恐慌長期蕭條），有效需求不足時，代表國家的政府才會介入，而且盡量以市場機制介入。

經濟自由主義是過份天真樂觀的，即使是如Smith，也不會想到自由放任的市場會變成壟斷的市場⁹。本章認為，政治自由主義則是比經濟自由主義更了解公共選擇的真正情形，贊成支持其任何一批評經濟自由主義的論點，C. E. Lindblom在經過實際政經制度研究後也認為，許多工作不是市場所能達成，人們需要其他制度協助（1977：89）。

然而，政治自由主義多數一心只想挽救資本主義，甚至到不擇手段的地

9. Wallerstein 認為真正資本主義的特質不是自由競爭而是壟斷，「…大家會驚異地發覺真正的社會主義內部的經濟運作似乎比一些資本主義經濟更近似資本主義假想的自由競爭市場」（柯志明，1986：115）。

步。Keynes 的「有效需求」理論是一種極力提倡浪費致富的理論，他甚至認為戰爭對人類進步有重要的作用（1973：130），據說當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時，Keynes 大為高興，認為可以一舉解決經濟大恐慌以來的蕭條問題（羅志如（等著），1993：190）。

人文傳統的Mill雖有心維護資本主義，但不致墮落至如後來Keynes式的心態，為此他陷入了深沈的憂鬱之中。在 1852 年為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寫的第三版序文中，雖然他以勞工階級尚未準備完成而反對社會主義，但卻對以合作社為名義的民主運動遭到鎮壓而深感同情。

1848 年是「經濟政治理想」關鍵的一年，Mill 想繼續維護資本主義，並希望將經濟研究拉回社會哲學的聯繫中（1965：xcii）；但是卻在同一年，年僅三十歲的 Marx，發表了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雖然是寥寥幾頁的小冊子，但卻一舉掩蓋了 Mill 苦心經營的經濟政治理想（Heilbroner, 1972：130）。

四、經濟政治的現實

自由主義的經濟政治是恆久不變的嗎？是普世皆準的嗎？這個問題在現實世界從封建社會進入資本主義社會之後，成了不需質問的命題。

懷抱人文理想的 Mill，其一生是那個時代苦悶的象徵，他想展望希望的未來，但卻仍無法丟棄過去的包袱：曾經的功利主義的信仰，變成他生命中的心靈危機，但他最後卻選擇加上「規範」而保留下來；為了人的潛能多樣性，他做了對思想自由絕佳的辯護，但卻慢慢發現可選擇的自由愈來愈少；他認為民主是可能最好的政府形態，但卻擔心多數專制而期待專家掌舵。本文認為，所有 Mill 思考上的困境都源於他無法對資本主義社會本身做更後設性的反省思考，他忽略了經濟政治孕育的資本主義已成一無法掌控的怪獸。

一切 Mill 忽略的，幾乎都由 Marx 正視，Marx 在經濟政治上的重要在此彰

顯¹⁰。

Marx 時刻

如果說，經濟政治的現實是每一個有良心的政治經濟學家所必須面對，並且無法逃避的話，那麼本文認為，所謂 Marx 時刻，正是政治經濟學首次正式痛苦面對這個問題的時刻。他之所以被稱之為科學政治經濟理論之始的原因，正在於他是第一位，那麼強而有力質疑現實存在即是合理的資本主義社會現狀。

Marx 認為古典經濟學家 Smith 與 Ricardo 等人，由於其資產階級狹隘眼界，使他們看不到或不願意看到資本主義社會的歷史侷限¹¹。因此，我們從過去以來所看到的經濟學家們，要不是像 Smith 那樣在各種矛盾的規定中兜圈子，便是像 Ricardo 那樣用強制抽象的辦法，簡單地抹殺現實過程的矛盾。

Marx 批判這樣的古典理論，認為它們是抹殺一切歷史差別、把所有社會形式都看成資產階級社會形式的經濟學（1975-95, 28: 42）。而這樣的政治經濟學只能是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學，在這狹隘階級類型觀點中，所看到的政治經濟學只能是一種「先驗幻相」。因此，Marx 說「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學只有在資產階級社會的自我批評已經開始時，才有可能理解封建、古代和東方的經濟學」（1975-95, 28: 43）。為此，Marx 在 *The Capital* 書中提出了辯證法作為拆解古典政治經濟學的鑰匙，並說了以下這一段掀起資本主義社會巨浪的話：

辯證法，在其理性（rational）形式上，它是對資產階級與其純空談的教授們的一種誹謗與憎恨，因為它在對現存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同時也包含了否定的理解，以及其不可避免的瓦解；由於它將社會形式的歷史發展視為不

10. Marx 說：「1848-49 年大陸的革命也在英國產生了反響。那些還要求有科學地位、不願單純充當統治階級的詭辯家和奉承者的人，力圖使資本的政治經濟學同這時已不容忽視的無產階級的要求妥協。於是，以 Mill 為最好代表的一種膚淺混合主義產生了。這宣告了資產階級經濟學的破產，…」（1975-95, 35: 15）。

11. 因此，當他們把政治經濟學定義為「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其實是指，如何在資產階級生產關係下如何獲得財富（1975-95, 6: 176）。

斷運動，因此是從暫時的性質，而不是瞬間的存在去理解事物；也因此沒有任何事物可以欺騙它，所以，它在本質上是批判的與革命的（1975-95, 35：20）。

從 Marx 以後，過去經濟政治的理想面紗被掀去，還原到真實世界的經濟現實。

自由貿易理論的現實

不過，儘管 Marx 極力批評經濟政治，資本主義的巨輪依舊往前滾動，從歐洲走向美洲，甚至成爲一世界體系。尤其在九〇年代蘇聯的「社會主義世界體系」瓦解，以及關貿總協（GATT）蛻變爲世界貿易組織（WTO）後，資本主義的經濟政治理想結晶爲一種現代的自由貿易理論。

在這一節中，本文將對「實存民主」¹²國家中高漲的自由貿易理論，提出異議，指出其依舊是資產階級的經濟政治觀點，是中心國家維持其經濟優勢的藉口。而這異議依舊從 Mill 說起。

早在 1848 年，Mill 在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書中即強調，自由貿易不僅可提高經濟福祉，同時可促進世界和平：

…。最後，首先告訴各國人民，應以善意盼望彼此的富裕與繁榮的，乃是通商。…再則，使本來與戰爭相對立的個人利益，強化擴大，而以非常之勢消滅戰爭的，也是通商。國際貿易的大規模擴張與急速增加，乃是世界和平的主要保障手段；因此，這對人類的思想、制度及性格的不斷進步，是一偉大而永久的保證；即使這樣說，當非誇張（1965：594）。

Mill 的看法與二十世紀爲關貿總協與世界貿易組織（WTO）極力奔走的人的看法是經百年仍不變，他們共同認爲樹立關稅壁壘等保護主義措施，是經濟災難，國際和平的絆腳石。關貿總協最後一任理事長 Sutherland 在 1994 年接受媒體訪問時，仍認爲對抗保護主義是當前最大要務¹³。

12. 「實存民主」（actually existing democracy）是指資本主義民主的西方國家（P. Anderson, 1992：109）。

13. Sutherland 說「我很擔心一種與時俱增的錯誤觀點，即認爲「全球經濟」不利於就業機會。事實恰好相反，這是在世界各地創造工作的機會。但變遷無可避免的會遭受阻力，並出現保護主義。我們未來最大的挑戰，就是如何合理的解釋保護主義有害而且危險，以對抗保護主義。保護主義有百害而無一利，我們必須使世人相信，額外的貿易將使雨露均霑，這不是輸或贏的問題，每個人都會是贏家」（《中國時報》，1994/04/06）。

但事實上，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許多第三世界國家（尤其是拉丁美洲）並未實行保護主義而與歐美等國廣泛進行自由貿易。但數十年下來的普遍結果，並不是如 Mill 所言的戰爭減少或是 Sutherland 所說的雨露均霑，而是第三世界國家普遍的災難：貿易條件惡化、社會貧富差距拉大、政局動盪以致生態環境的破壞。這一切使我們無法天真地相信自由貿易是百利而無一害。

問題的根本原因在於，關貿總協一開始就充滿著美國的霸權色彩¹⁴，它一開始就是要為中心國家的國貿利益量身定做，即使是今天的世界貿易組織也是如此。而其中的關鍵是，自由貿易從來就是具有選擇性的：商品可以自由流通，勞動力卻不能。也就是，中心國家的商品可以自由地到邊陲國家，但邊陲國家的勞力卻不能自由地到中心國家，這樣的不平等交換是造成中心國家與邊陲國家差距日益擴大的根本原因（Arghiri Emmanuel, 1972）。Marx 說出了這種自由貿易，其選擇性自由的真相，「資產者對於他自己統治制度的態度就像猶太人對待法律一樣：他在每一個別場合只要有可能就違反這些制度，但他卻要所有其他人去遵守它們」（1975-95, 5：180）。

因此，如果要強調自由貿易的話，不應只強調資本與商品的自由，勞動力也應自由，不過，這對中心國家的資本家而言是期期以為不可。為此，埃及的經濟學家 Samir Amin 為邊陲國家提出一種「有距離」（delinking）的政策，邊陲國家應把國內產業置於國際產業之上，如此才有可能擺脫中心國家的剝削（1985）。而德國綠黨經濟學家們（The Group of Green Economists）也有同樣的看法，他們甚至強烈主張，如果發達國家不對自由貿易改弦易轍，那他們將極力鼓吹邊陲國家的勞工向中心國家進軍（1992：9）。

然而從 1974 年 5 月由邊陲國家主導的「聯合國大會關於建立新的國際經濟秩序宣言」之後，許多邊陲國家明知會受中心國家支配，但仍積極尋求

14. 葉國興從 GATT 創立的歷史，說明美國霸權的真相。原來 GATT 的締結僅是「國際貿易組織」成立前的暫時性措施，但因美國抵制 1948 年 3 月在古巴哈瓦那草簽的國際貿易組織憲章，致使「國際貿易組織」成立無期，GATT 遂成為國際貿易的主要規範（林正義、葉國興、張瑞猛，1990：52）。

外資。本文認為，這之中的原因不在於經濟方面，而是在政治方面：在這些國家中，與經濟貧困連結的，通常不可能是一個民主健全的社會，而是專制威權的體制。威權統治者本身作為本國人民的掠奪者（某些時候也是保護者），外資可作為其政權鞏固的基礎，某些人民（大部份是都市人民）因此可獲得工作，但大多數人民（大部份是鄉村人民）則會更貧困。這個時候，對這些自願受外資支配的邊陲國家，新權威主義是他們的政治統治信仰，今天中南美洲國家秘魯就是此一典型例子。

事實上，與 Mill 在 1848 年發表自由貿易可促進世界和平的同一年，Marx 在布魯塞爾民主協會的公眾大會上，發表“Speech on the Question of Free Trade”時，老早就說明了這自由貿易的假象與後果：

先生們，不要用自由這個抽象字眼來欺騙自己吧！這是誰的自由呢？這不是每個人在對待別人的關係上的自由。這是資本家榨取工人的自由（1975-95, 6: 463）。

十九世紀 Marx 時代，自由是資本家的自由，而今，則是中心國家的自由。Eric Hobsbawm 說「自由成了一些人的口號，這些人最不需要自由，並且不想把它給予那些最需要它的人」（Samuel Bowles & Herbert Gintis, 1986: 152）。

五、政治人類學觀點下的經濟政治

必須把 Marx 對歐美資本主義的診斷，放到更廣闊的人類學視野上觀察。事實上，歐美經濟文明也只是這個世界經濟文明中的一份子，許多經濟思想家常會遺忘這一點，甚至誤把歐美經濟文明視為唯一、普世都應遵行的世界經濟文明¹⁵。而人類學的視野可幫助我們克服這種歐美中心主義。

15. 如 J. A. Schumpeter 所分析的經濟史，從頭到尾講的都只是西方的經濟史，但其書名並不以西方限定，而是普遍通稱為《經濟分析史》（1994）；Sabine 也一樣，講的內容是西方政治思想史，但書名卻是《政治理論的歷史》（1973）。

經濟與社會

1. 經濟從屬於社會

從 Polanyi 經濟人類學的角度看，經濟政治理想的經濟自由主義其最獨特的主張在於，他們將經濟活動獨立於複雜的社會網絡之外，並認為這是合乎自然的。然而事實上，這樣的主張在人類經濟發展史上，是到近世才有的，Polanyi 說：

從陡峭的世界性市場經濟的頂峰向後回顧，我們必須承認 Aristotle 在其 Politics 一書的緒論中，將「家務管理」與「獲得金錢技術」之間做了一個在社會科學領域上有預示性，聞名且好的區分。Aristotle 主張「家務管理」的本質是爲了使用的需要而生產，而非爲了圖利的需要而生產；…（1957：52-4）。

Aristotle 可能沒想到，他在城邦時代所做的使用原則與圖利（筆者按，可等於在前面釋義的「營利」）原則區分，是民族國家時代的資本主義文明與其他文明區分的關鍵。當使用原則仍高於圖利原則時，這個文明是經濟從屬於社會的，也是尚未資本主義化的文明；而當圖利原則高於使用原則時，那這文明是經濟高踞社會之上，是今天資本家文明的天堂。

在 1852 年一位印第安酋長 Seattle 回覆給當時美國政府的一封信的內容中，更讓人感受到這兩種文明的分野，酋長說「在華盛頓的總統寫信給我，他表達要買我們土地的意願。但是，你怎麼能夠買賣天空？買賣大地呢？這種概念對我們而言是很陌生的。假如我們並不擁有空氣的清新與流水的亮麗，那麼你怎麼能買它們呢」（J. Campbell, 1988：34）？對於酋長來說這土地上的空氣清新與流水亮麗，是屬於這個美麗世界所有生物「整體」共有的，當然不能買賣，他是完全無法理解歐洲資本主義所盛行的市場概念。

前面曾經提到在 Smith 的著作中，不僅有一般人熟知的崇尚市場萬能的經濟學之父圖像，也有他另一面以國家整體福祉爲依歸的論述。但是後世的資產階級卻只推出他主張讓市場自由發展的一面，而將他另一面對國家整體財富看法置之不顧。

Smith的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出

版於 1776 年，那時工業革命才剛剛開始，但到他晚年時（1790 年過世），這文明的弊病開始顯露出來，美麗新世界的幻夢漸漸破滅（G. de Ruggiero, 1967：50）。在 Smith 晚年時，他對製造業與商業有嚴厲批評，認為商家與廠家那種卑鄙的貪婪性與壟斷化的野心，不該也不配作為人類的統治者（Heilbroner, 1972：66），他甚至勸告「有錢人應分享財富給為他們工作的貧苦者」（Jacob Oser & W. C. Blanchfield, 1976：64）。雖然，我們並無法確切得知 Smith 晚年的完整看法，但從他的遺囑中要求立刻燒毀他未出版的草稿，可見他的灰心與悲觀。

本文認為，Smith 並沒有特地要維護某一階級的利益，他關切的毋寧是如何促進國家整體的財富，至於財富，Smith 認為它係包藏於社會上所有的人所消費的物品裡。可以說，當 Smith 發現「經濟學」時，他並沒有要讓經濟學獨立於社會科學之上，即使是在 Bentham、Mill 那裡，也拒絕經濟學抬高到政治學之上。然而從他們以後，政治經濟人變成純粹的經濟人，使用原則那種深具人文色彩的文明，在英國可以說結束了，Polanyi 以一種輓歌式的口氣說：

在一個世紀之後，像 Bentham 那樣的人已經無法存在。一旦工業生活的市場組織變成支配性的制度，其它所有的制度都必須臣服於這一形式的制度；那些主張以人為方式來改造社會的天才們現在已經找不到買了（1957：121）。

現實世界裏，人文的關懷的確已成過去，剩下的是資產階級的主張——讓市場去對付貧民。

2. 經濟主宰社會

擺脫使用原則的束縛，圖利原則如脫韁野馬般，自此，社會科學有了一個新的起點，也就是從獸性的角度來看人類的社群。

Aristotle 曾經說過只有神與野獸才能生活在社會之外，而人類則不屬於這兩者。基督教思想中認為人與獸之間的區別也是本質的，即使是對生理現象的研究也絕不會與神學上研究人類團體的精神起源相混淆。而對 Hobbes 而言，假如人是虎豹豺狼的話，也是因為人在社會之外才會像虎豹豺狼，因

此，人需要一位專制君主使人類社群免於動物世界的無政府狀態。但在 Mandeville、Townsend、Malthus 的眼中，人類實際上就是禽獸。

這樣一種獸性圖利觀點的經濟人圖像，在 Daniel Defoe 的 *Robinson Crusoe* 書中小說主人公 Crusoe 身上得到充分的理解。一個漂流到孤島的 Crusoe 如何根據他的經濟個人主義原則建立起他的金錢帝國：他認為他生活中最大的不幸是安靜地坐在那裡，而最大的快樂是來自檢查他所貯藏的貨物。十九世紀寫實小說家 Charles Dickens 根據 Defoe 對婦女的態度，認定他本人一定就是「一件異常枯燥而又討厭的商品」，而 Marx 也認為他是資本家的原型，然而 Max Weber 卻指出這是現代資本主義與眾不同的技術特徵（Ian P. Watt（瓦特），1992：65-73）。

當 Max Weber 將資本主義精神的探原指向基督新教倫理時¹⁶，我們只能說，這種極端經濟個人主義——經濟主宰社會，可能在他內心最空虛的地方找到了宗教的慰藉以及合理化藉口。但這樣的後果更糟，因為當這樣心理上取得平衡時，資本家們更肆無忌憚的剝削著他人，創造了這個有史以來最疏離最冷漠的世界。

超越唯經濟論的謬誤

1. 向經濟人告別

Robinson Crusoe 的一些法文譯本讓 Defoe 對自然大唱讚美詩，以“啊，大自然呀！”為其開端。其實 Defoe 的原意並不是如此，荒島上的自然景象需要的不是敬仰，而是開發。當 Crusoe 高興地仰天大笑時，不是因為自然景觀美麗，而是田產有了豐富的收穫。他認為這無窮無盡的大自然，需要的是無窮無盡的開發。

16. Weber 說，「一種特殊的資產階級經濟倫理形成了。資產階級商人意識到自己充分受到上帝的恩寵，確實受到上帝的祝福，他覺得，只要注意外表上正確得體，只要道德行為沒有污點，只要財產的使用不遭到非議，他就可以依從自己的金錢利益，同時他這樣做還會讓自己感到是在完成一種責任」（1976：176-7）。

事實上，早 Defoe 幾十年的 J. Locke 一樣有同樣的生態豐裕假設，因為在那個時期，歐洲人來到了美洲。Locke 認為「至少還留有足夠同樣好的東西給其他人」（1980：19），因此，每個人皆可確立他的財產權而不致會發生衝突。而到 Smith 時，他還是這麼想的。

然而，幾世紀前這種生態豐裕的前提在今天已成天方夜譚。今天不僅生態不再豐裕，事實上，我們生存的地球正面臨有史以來最大的生態危機。而這危機最主要的根源，來自 Defoe 那種「經濟人」不斷開發、開發的想法，加上那好戰的自由貿易信條，使得大自然長期辛苦所創造的，在短短幾百年間，就被我們這幾代人揮霍殆盡。

如前面曾經提及，Smith 晚年對製造業與商業的批評，而 Mill 也開始注意這種無窮盡開發所可能造成的問題，並提出一種和一百年後 The Club of Rome（羅馬俱樂部）在《成長的極限》一樣的經濟零成長主張：

如果地球因無限制增加財富與人口而使物質耗盡，則必然會失去大部份從物質得到的快樂，那麼爲了使它支持一個較大的、而非好或快樂的人口數，我虔誠地希望，爲了後代子孫，在窮困壓迫到來之前，他們就能滿足於穩定狀態（1965：756）。

然而也正如前面所述，這種人文的呼籲拉不住脫韁的圖利原則，這樣的資本主義從一國走向國際的帝國主義。

英國費邊社的 J. A. Hobson 在對帝國主義的研究中，再一次要求人們回顧 Aristotle 的教導，認爲經濟應強調質的提升，而非僅量的成長（1967：92-3）。而即使是以刺激有效需求解救資本主義的 Keynes，曾經鼓勵人們著眼短期利益排拒長期考慮¹⁷，但他後來也堅決反對這種圖利原則的經濟人價值，他發現這樣經濟繼續發展下去的話，「將使人類品質中最令人厭惡的部份，上升到最高德性的位置」（William Ophuls, 1992：301）。

「經濟人」整天汲汲營營爲了賺錢，但卻忘了賺錢的目的何在？事實上，錢夠用就好，不要把後代人要賺的錢，或後代人要享用的資源在我們這

17. Keynes 曾說「長遠看，我們都已死」，在這個自滿的年代，人們只著重短期，而拒絕對長遠未來的關心（J. K. Galbraith, 1992：82-3）。

一代快速揮霍殆盡。想必遠古的以及未資本主義化的人們，如印第安的酋長，一定無法理解現代人的「經濟人」觀念，把生存環境弄的如此之惡劣，還仍一味追求經濟成長。

Ophuls在其 1978 年獲得美國政治學會凱末爾獎的著作Ecology and the Politics of Scarcity書中，再一次希望向「經濟人」揮別：

現在以經濟學為首位的政治經濟學典範必須轉變至政治學上。市場仍是執行重要經濟工作的主要工具，但它將不再是決定分配社會價值的主要形式。同樣的，經濟學也不再是自工業革命以來的顯學，它將變得較為溫和但仍然是生態政治學的重要僕人角色，並且以尊重自然法則及人類長遠利益的方式，支持政體的物質目標與管理人類的生態家計（1992：235）。

不過，筆者仍然懷疑，類似如此溫情的呼籲，一個世紀以前就找不到買主了，而今天可能嗎？

2. 是「結構生態學」而非「生態現代化」

溫情的呼籲如同今天對待生態問題，僅是一種「生態的現代化」，而不是一種「結構的生態學」¹⁸。它僅僅是對「經濟人」大架構下做一枝枝節節的修改，如「舉手之勞作環保」口號一樣，不僅於事無補，反而讓許多人在罪惡心理得到補償之餘，進行更大的消費破壞。從 1992 年在巴西舉行的地球高峰會可看出，這樣一種沒有結構轉變的盛會——即使是全球最大規模會議，也是無法改變現狀，甚至問題更為嚴重。

事實上，地球高峰會是東西冷戰結束後，國際上第一次這麼大規模的討論表面上是環保，但實質卻是所謂的南北問題。南北問題簡單地說，就是中心國家與邊陲國家日益擴大的貧富差距，以下的數據會使任何一個有良心的中心國家成員感到不安：

根據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資料顯示，工業化國家與開發中國家，平均每人GNP的差距，從 1960 年的 5000 美元對 300 美元，到 1986 年的

18. 德國綠黨經濟學家們認為，對於生態惡化問題有兩種截然不同的對策：一種是「生態現代化」（ecological modernization），如Brandt報告，仍舊是依循工業化國家的經濟成長路徑，只不過做一些修改；而另一種則是「結構生態學」（structural ecology），力圖改變現在的資本主義結構（The Group of Green Economists, 1992：20-1）。

10000 美元對 1000 美元，其間差距仍在不斷擴大中；每一個美國人的能源消耗量是非洲坦尚尼亞人的 160 倍，以及亞洲尼泊爾人的九百倍；已開發國家人口只佔全球四分之一，但卻消費出全球四分之三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單單美國在溫室氣體排放量上達百分之十七點六，美國人口僅佔全球二十五分之一，但卻污染近五分之一¹⁹。

以上是中心國家與邊陲國家在資源使用與污染源上的嚴重差距，而且這個距離正日益擴大中。而更令人擔憂的是大部份中心國家將本身國內問題轉移至第三世界。例如在中心國家受民意抑制的有害工業，如軍火、煙草與核電等，卻得以在邊陲國家暢通無阻，尤其是有毒廢棄物（特別是核廢料）的越境移動，從歐美移向非洲與南美洲（日本環境廳，1990：64）。

對於南北問題的解決方案，一直存在有兩種看法，其主要的分歧在於是否要更動自由貿易理論背後的資本主義結構。第一種是要與資本主義妥協的 Brandt 委員會主張，它是由西德前總理（社會民主黨）W. Brandt 在 1977 年推動成立，其積極主張南北對話以及東西緩和，他希望在不改變私有制的前提下，逐步地對現存資本主義制度進行改良。對於南北問題的解決，他們的看法主要有以下三點：

北方國家面臨的危機是生產與消費不足，這是工業衰退。南北都共同面臨需求不足，北方是消費需求不足而南方是基本需求不足。

解決的方式是透過貿易的增加，北方使南方富裕起來，進而使工業產品需求增加。

促進南方經濟成長的方式是，透過貿易消除貧窮，並使南方的基本糧食需求獲得改善（M. Redclift, 1984：56）。

本文認為 Brandt 委員會的主張是一種以毒攻毒的策略，對於因自由貿易所引起的問題，還要用自由貿易方式解決。難怪他們永遠無法理解，他們近二十年來的關心，結果卻是問題更加嚴重。Wallerstein 對他們一味主張自由貿易，不願正視整個世界政經結構的不平等，嘲諷地說，何以 Brandt 委員會中多數是政治人物，但「政治學卻奇怪地在報告中缺席了」（1991：102）。

Redclift 針對 Brandt 委員會，引述前東德綠黨理論家 R. Bahro 的觀點，

19. 以上數據分別來自 The Group of Green Economists（1992：9, 16）與 Daniel Sitarz（1993：pix）以及 Paul Kennedy（1993：117）。

提出一種要更動資本主義結構的第二種看法，以下四點是為回應：

北方國家是過度生產與消費在錯誤的財貨上，尤其是軍備武器，這是生態危機的基本原因。

北方國家解決的方式是「去工業化」，降低北方國家之間非必要消費品的競爭，這同時也可以解決北方國家內的不平等問題。

北方國家降低成長可以減緩對南方國家初級原料的需求，如此資源保護才有可能。

生態危機是北方國家工業國家成長的副產品，北方國家須改變生活方式，並幫助南方國家解決都市化、技術與醫學預防等問題（1984：56）。

事實上，「結構生態學」就是一種馬克思主義觀點的生態學，十九世紀馬克思主義在二十世紀所必須面對發展的，Foster-Carter 甚至說「那些認為環境破壞與馬克思主義無關的人，只能證明一件事，那就是他們選擇稱呼的馬克思主義是與現在世界脈動無關的」（1974：94）。

Robinson Crusoe 的作者 Defoe 說，他人生最大的不幸是安靜的坐在那裡，而 Pascal 卻早先寫道：人的所有不幸都起因於一個事實，也就是他們無法安靜地待在他們自己的房子裡（1990：196）。資本主義下的「經濟人」，正如 Pascal 所說的，無法滿足於合適且好的生活，永遠停不下來地追求經濟成長。這樣的「經濟人」事實上是最理性（rational）的手段達成最不理性（unrational）的目的（A. Gorz, 1989：1），雖然「個人」帳面不斷地經濟成長，但「整體」生存環境卻因此而日益惡化。

而這種忽視「整體性」的經濟政治，在今天不僅有它庸俗的一面，如情人節、聖誕節等各種重要節日，愈來愈嚴重的商品化炒作情形；而也有它恐怖的一面，如武器銷售與前幾年發生的日本神戶大地震，都被資本家視為經濟復甦的契機，戰爭與災難成為經濟政治運轉的重要機制。

六、經濟政治的可能

面對冷戰結束所謂工人祖國蘇聯的垮台，本文認為，愈發顯示 Marx 當年質疑蘇聯是否可能直接跳過資本主義走向共產主義的重要：

現在問題是：俄國公社，這一固然已經大遭破壞的原始土地公共所有制形

式，是能夠直接過渡到高級的共產主義的公共所有制形式呢？或者相反，它還須先經歷西方的歷史發展所經歷的那個瓦解過程呢（1975-95，24：426）？

事實上，Marx 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從一開始就是作為資本主義的對立物而存在的，與資本主義皆同屬於一種經濟政治。因此，本章將首先對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提出反省，指出它們都是經濟政治，在二十世紀皆造成一種後極權社會。本文認為，擺脫以上困境的辦法是一種有法則規範可循的「整體性法律」觀點理論，如此經濟政治才有可能。

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問題

1. 都是一種經濟政治

Marx 對於俄國的猶疑不是沒有原因的，因為當時俄國社會經濟形態仍停留在非常落後的農業生產狀態，而 Marx 也非常清楚資產階級社會是歷史上最發達的和最多面的生產組織（1975-95，28：42），如果直接要跳過資本主義這一階段——從落後農村到共產主義，難度是非常高的。

也許因為革命形勢的嚴峻，Marx 最後幾乎完全放棄客觀認識上考量，而以一種主觀意向上的樂觀，期許俄國產生紅色革命。本文認為，所有「實存社會主義」（E. Altvater, 1993：vi）的最後失敗，包括 Lenin 晚年對官僚主義復辟的悲觀，事實上，最早都來自 Marx 此一判斷上的錯誤。P. Anderson 稱 Marx 此一判斷為「經濟崩潰主義」：

The Capital 體系所得出的最危險結論，是關於利潤率下降的一般原理，以及關於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產生日益嚴重的兩極分化的信條。這兩點都還沒有得到合適的證實。…因此，在晚期 Marx 著作中缺乏合適的任何政治理論，按邏輯推理，可能同他經濟理論中潛在的崩潰主義有關，這使得政治理論成為多餘了（1976：115-6）。

本文無意於落入究竟經濟是不是唯一重要的本質主義討論中，筆者的看法是：對於歷史發展，經濟的確有其絕對的重要性，但將經濟因素抬高到一種歷史發展的本體優先地位則是言過其實。Marx 天真地認為只要資本主義造成的經濟剝削解除，則一切問題從此都迎刃而解，但事實上，從「實存社會

主義」的實踐過程看，其實一切嚴重問題才剛開始。

而九〇年代以來，蘇聯 Gorbachev 的最後失敗與鄧小平死後所留下的目前中國困局，事實上都可以從上述「經濟崩潰主義」中，其對「政治——經濟」互動的錯誤判斷上找到答案。Marx 對於「政治——經濟」互動的理解是：當經濟制度愈往前進，政治上意見矛盾就會愈少，所以在資本主義的矛盾比封建制度少，而共產主義的矛盾則比資本主義少，最後因資本家被完全消滅而沒有矛盾了。Marx 如此政治樂觀的原因是認為，留下來的都是工人，由於工人的工作相同、喜好相同，對政治的看法也不會相左，因此，「無產階級專政」是可能實現的。

然而真實的情況卻完全相反：經濟發展將會使政治矛盾更加增加，每個人經濟獨立後，其利益與主見將更為不同，需要一更複雜的政治機制來設法調解這因多元而產生的衝突，例如法治與選舉。但這些在 Marx 的「經濟崩潰主義」中完全沒有任何地位。因此，Gorbachev 不能理解為何改革不是帶來共產制度的生機，而是整個共產政治體制的瓦解；而鄧小平也納悶為何他選定的接班人胡耀邦、趙紫陽後來都變成反革命份子，而他必須一再關魏京生免得政局失控²⁰。

2. 都是一種後極權社會

活在「實存民主」的資本主義社會人們或許不願意承認，其與「實存社會主義」是大同小異。除了「實存民主」有資本主義式民主的緩和（但非解決）危機外，但基本上都是一種後極權社會。

當八〇年代美國總統 Reagan 說蘇聯是邪惡帝國，他是不會承認他增加國防支出、籌畫星戰計劃以及在歐洲部署潘興二號飛彈等等擴大軍產複合體結構時，他與他的對手是如出一轍的。甚至這樣表面對抗，歸根究底的觀察卻是彼此互相依存。事實顯示當 Gorbachev 打算結束冷戰時，引起美國軍產

20. 以上幾段參考 Arthur Waldron (林蔚) 在《自由時報》刊登的文章，「『中國的佛朗哥』？鄧小平差遠了！——未能體察改革全貌，坐失歷史契機」，1997/02/21-2。

複合體的恐慌與阻撓（戈巴契夫，1990：261），它們希望「實存社會主義」繼續存在。而後來也證明，因冷戰結束，西方國家軍火工業陷入長期的蕭條，西方國家的經濟也受到影響。

有關「實存社會主義」的極權狀況，西方主流論述已談的很多，這裡不再重述，但有關「實存民主」的後極權狀況，則是隱蔽不容易察覺。正如當選捷克總統的 V. Havel 即批評西方人不了解這場後極權危機的真正根源，他說：

這種對人在世界位置的現世挑戰，當然也發生在西方世界，唯一的差別只是社會及政治的表現形式有所不同。Heidegger 直稱這是民主的危機。沒有真實證據顯示，西方式民主，亦即傳統議會模式民主，能夠提供一個更為深刻的解決方法。甚至可以說，西方民主（比起我們的世界）提供更多生命真正目標的空間時，危機就愈為隱蔽，人們就更泥足深陷（1985：90-1）。

事實上，當許多「實存社會主義」國家已經察覺到顯性極權而開始做質與量上的改變時，「實存民主」仍停留在冷戰結束自滿的消費社會中。

今天資本主義社會的後極權本質，是一種建基於中心國家「歷史性妥協結構」中，它無所不在天羅地網的細膩地掌控著每一細節。如果說，十九世紀資產階級所控制的社會是一個僅有經濟層面、笨拙的體制的話，那麼二十世紀所形塑的社會是涵蓋經濟以外的所有「文化霸權」。A. Gramsci 在本世紀前半葉就察覺到正是這樣的新形勢，使得社會主義革命是發生在蘇聯，而不是在歐洲大陸，並提醒左派運動者注意這種「文化霸權」對抗的重要（1971）。

Marx 在十九世紀時，即對實證主義者 A. Comte 做過類似的批評，Marx 為此還稱許巴黎工人對 Comte 學說的免疫，不過，由於資產階級在二十世紀「文化霸權」的控制增強，使得二十世紀發達工業社會的工人（或中下階級）不但沒有這樣的免疫，而且還熱烈擁抱這種舒舒服服、安然自得、異化的消費社會。

於是整體說來，發達社會的人大都成為 H. Marcuse 所說的「單向度的人」。這樣的人，除了滿足於生物性與功能性的消費需求外，他們不願也拒

絕對現存的資本主義社會進行結構性反省。Marcuse 認為，這樣的人已經沒有能力去追求、想像一個與現實生活不同的另一種生活方式。於是，一種表面價值中立，但實質上是維護資本主義結構的肯定性思惟方式（如實證主義與分析哲學），成為社會思考的主流（1964）。

雖然，Marcuse 的政治哲學語彙與 Havel 的文學直覺感性不盡相同，但他們說的與擔心的是同一件事。

整體性觀點的法律理論

雖然如此，即使「實存社會主義」帶來了令人失望的結果，但我們仍不應完全忽視原來的社會主義理念，對資本主義文明化（戈巴契夫，1994：6）產生的實質貢獻。而冷戰結束給我們的啓示是，我們實沒有必要再去建立另一個「蘇聯式社會主義世界體系」，重要的是如何在這個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瓦解改造它。

本文認為，從政治自由主義而來的「整體性觀點的法律理論」是改造的一把鑰匙，而這也正顯示，其實，左派還沒有一套漸進可行的政治經濟學。這整體性觀點的法律理論並不是要否定以上的結構（在某個意義上也可稱之為包袱），而是要馴服這個結構。

「整體性觀點的法律理論」知道完美的公共選擇是不存在的，過去的單一市場與單一國家（或者是市場國家皆不要）的主張，都是一種經濟政治，也都造成「市場失敗」與「國家失敗」（或者成主觀想像的烏托邦）。而作為一種整體性觀點的法律理論，即是在體認到這一現實後，試圖將經濟重新納入社會複雜網絡之中。

1. 沒有完美的公共選擇

市場失敗

K. J. Arrow 曾在其 Social Choice and Individual Values 書中，以邏輯推論方式同樣證明完美的社會選擇不可能，是為「Arrow 的矛盾」。因此，Arrow 認為「當市場無法達到最適狀態時，社會至少須承認這市場的落差，並且非

市場的社會制度應起而彌補這之間的落差」（1971：137）。

「Arrow的矛盾」，代表功利主義從人性較正面的角度尋求公共選擇，但仍不可得；而從人性較負面的角度看公共選擇，則會陷入「囚犯困境」²¹更糟的處境。因此，「市場失敗」顯示從個人主義出發，是不可能得到合理的公共選擇，而這也是為何最早時候，人們要把經濟從屬於社會控制之下的原因。

國家失敗

事實上，如果根據 Marx、Engels 的原意（尤其是 Engels），共產主義的看法是不要市場也不要國家，因為國家是階級壓迫的工具，隨著階級的衰落，國家也不可避免地要衰落（Engels, 1975-95, 26：272）。而到了 Lenin 這裡，對待國家的否定態度已經變成他的一個政治標準，他說「無產階級所需要的只是逐漸消亡的國家，即組織得能立刻開始消亡而且不能不消亡的國家」（列寧，1972, 3：182）。然而諷刺的是，Lenin 爲了鞏固政權，他和他的對手一樣，需要國家維持秩序，爲此 Lenin 創造了有史以來最大的國家官僚組織。

事實上，不管是 Lenin 的無產階級國家，或是經歷經濟大恐慌由 Keynes 想出辦法挽救資本主義的資產階級國家，都是以階級立場出發，以該階級的利益爲主要考量，緩和可能的衝突。當 Engels 在 *The Origin of the Family,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 中分析國家是社會之上的力量——其目的是緩和衝突並維持秩序（1975-95, 26：269），他是正確的，但他萬萬沒想到 Lenin 後來所造成的國家也是如此。

21. Rawls 說 Hobbes 的自然狀態就是這一「囚犯困境」的典型例子。我們想像有兩個要由檢察長分別審訊的囚犯。他們都知道：如果他們都不認罪，那麼由於一個輕微的犯法行爲都將只會被判一年；但如果一個人認罪並供出對同犯不利的證據，那他將被釋放，而另一人將被判十年重刑；而如果兩人都認罪，則兩人都會有五年徒刑。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每個囚犯都以自利出發不考慮他人，則他們將會得到最糟的結果，也就是兩個人皆被判五年（1971：269）。雖然這是一個人性反面的例子，但若就事論事，囚犯們最好的「公共選擇」應是都不認罪，其結果是各個人只有一年徒刑。但若囚犯以個人自私自利出發，則其最後的「公共選擇」卻是最糟的。

由這樣階級觀點出發的國家，想要合理解決公共選擇問題是不可能的。資產階級國家造成浪費無效率預算赤字龐大，一如 Buchanan 所批評的「國家失敗」；而無產階級國家不僅「國家失敗」，同時也造成專制獨裁的局面。

2. 一種整體性觀點的法律理論

但是，人們真的可以因為沒有「完美的公共選擇」，就放棄它，回到雞犬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的小國寡民狀態嗎？本文以為，雖然完美的「公共選擇」是難以企及的，但一種有整體性觀點的法律理論是可依循的憑藉。

「整體性觀點的法律理論」的主要架構，來自 R. Dworkin 的 Law's Empire，其法學思想中對法律流派的區分：因襲主義（conventionalism）、實用主義（pragmatism）與整體性（integrity）。事實上，法律正是將公共選擇做一明文的規定，以利於眾人遵循，因此，運用到公共選擇的詮釋是恰當的：資本主義興起以前的公共選擇是少數封建階級任意的國家決定，是一種任意的因襲主義；資本主義時期的公共選擇則是資產階級的市場決定，是一種無目的性的實用主義；共產主義原本要朝向整體性的公共選擇，但卻因資本主義發展不足，退回到前面的因襲主義；而整體性的公共選擇觀點，則是在體認到前面的教訓，提出一種超越市場與國家狹隘階級觀點的法律理論。

因襲主義

這是公共選擇的第一階段。法律因襲主義者主張，根據慣例法律決定總是不完全的，因為總會有以往傳統上沒有遇到過的新問題出現，在這樣的情形下，當事人沒有法律權利可言，法官則依其觀點自由任意裁決這些新問題（Dworkin, 1986：115）。

如此自由裁量的法官猶如過去封建時代統治者化身，由他來任意決定公共選擇的最終判準。如果說，早期人民不懂法律，希望由熟悉法律的法官帶領，這是人之常情。但如果將這樣的公共選擇觀點運用到政治上時，則會形成一種唯心任意的國家選擇。不管統治者對於公共選擇的決定如何仁慈，如何為多數人民著想，但這對於眾人公共選擇能力的養成是有害的。任意暴君的禍害不用說，即使是仁慈君王的慈悲選擇，也將會壓制人民對於公共選擇

事務的學習了解。因此，當自由主義起而要推翻這種前現代的封建體制時，他們代表的是一進步的力量，它的有效批評，使得今天任何一種嘗試恢復「因襲主義」主張終歸徒勞。甚至可以這麼說，任何一個傳統封建社會都需要自由主義這一批判過程使成爲現代化社會。

事實上，資本主義這一過程的無法超越，可能正是指它對前現代社會「因襲主義」的破壞上，其不可或缺。我們看到原來落後的封建社會，如蘇聯與中國，宣稱其可跨越資本主義階段直接到共產主義，但卻因爲沒有經歷過自由主義對此一因襲傳統的對抗過程，其後來都變成封建主義與官僚主義的復辟。所以當 Lenin 與毛澤東的革命先鋒隊，高喊「無產階級專政」時，他們實質上在重複過去封建專制時代的君王行徑。所不同的是，過去只有君王知道公共選擇該如何做，而現在則是，只有無產階級「革命先鋒隊」知道公共選擇該如何做。

實用主義

這是公共選擇的第二階段。法律實用主義者把法律看作是實現社會目標的「手段」，他們只根據現行政策、看得見的社會多數利益以及是否對將來有利進行判決。Dworkin 說這是一種比因襲主義更有力、更能讓人信服的法律見解，而且是後面「整體性」法律理論的一種較強的挑戰（1986：153）。

這樣一種強調明顯可見的社會多數利益的法官，猶如資本主義時代資產階級的化身，他們強調由只講手段不講目的的市場決定公共選擇。而這仍是理解的，因爲當人民剛學習到如何公共選擇時，初懂法律時，會形成一種天真自我中心的想像——一切由市場決定。至於應把這公共選擇的決定權推己及人，在這個階段則還未學習到。

但如果將這樣的公共選擇觀點運用到政治上，則會形成只強調手段的市場決定。如此之排除目的性的市場公共選擇是可怕的，我們只要回顧前面經濟政治所造成的階級對立、南北與生態問題，就可知此一公共選擇的弊端。

手段不可能脫離目的，正如市場不能脫離社會，當資產階級把封建時代任意的國家轉變爲市場時，另一方面，他們卻在現實上，排除了大多數無法

在市場發聲的中下階級。如同 Dworkin 在批評法律實用主義者並沒有認真看待權利時（*Taking Right Seriously*），他說對了；作為公共選擇的市場，的確是沒有認真看待在市場之外的人的權利。這造成資產階級認為市場以外的中下階級是不屑一顧的，而邊陲國家的人民更是不值一提。

整體性

這是公共選擇的第三階段。Dworkin 認為這種整體性的法律，其主要論點不是要由法官依其觀點自由裁決，也不是只為實現社會目標提供有效手段，而是根據一種前後一致的「原則」方式，對待社會中的所有成員（1986：225）。

這樣觀點認為，法官只是做為一闡釋者的角色，他所闡釋的法律帝國是由態度界定，從更廣泛的意義來說，這是一種談及政治的闡釋性的、自我反思的態度，它是一種表示異議態度，使每個公民都應負責地去想像什麼是他的社會對原則的公共承諾，而在新的情況下這些承諾的要求又是什麼（1986：413）。在經歷前兩階段的公共選擇學習，為避免大家陷入囚犯困境，人們最終會知道這樣一種整體性觀點，是可使人們脫離彼此以鄰為壑的深淵。

如果將這樣的公共選擇觀點運用到政治上，則會是一支持整體性的民主觀點。這個觀點的最高原則是，所有公共選擇的目的，是為每一人民而存在，每一件公共選擇事務，皆應透過人民充分發表意見，由熟悉此一事務的闡釋者彙整，形成最大共識。在這過程中，意見改變然後闡釋跟著改變是其最大特色，只要情勢改變，人民想法改變，一切都是可變動的。

因此，在這樣的情況中，任一優勢者的因襲主張是不存在的，因為每個人對於公共選擇都是平等的一票；另一方面，實用主義的市場，僅只能是輔助性角色，凡是多數人民共識以外的，尚未形成明顯意見時，市場具有效率功能，幫助這些意見形成多數意見，在這之中，沒有人會被排除在外。唯有這樣一種整體性觀點的法律理論可以推己及人，將眾人團結形成一休戚與共的命運共同體，共同邁步走向光明的未來。

在經濟政理想與現實之中，透過「整體性」觀點重新找尋經濟政治的可能，筆者以整體性觀點的法律理論作為解開「經濟政治之謎」的依據。

然如今處在後民族國家時代，面臨的不只是一國之內的階級問題，而是種族、文化等國際性問題。我們發現：屬於一國之內的整體性法律，在國際上則變成因襲或實用的法律，如西方人原本認為的自由貿易，放到國際上就可能變成不公平貿易。

面對這樣新的「當代」局面，本文認為，再一次地考驗著人們公共選擇學習的能力可以推到多遠。雖然目前一種國際規模的整體性觀點——國際體制²²，已逐漸獲得重視，但距離能擺脫中心國家自我中心的觀點還很遙遠。然而，一國之內的經濟政治認識都尚且困難，更何況是一種國際規模的經濟政治認識，那更是難上加難。不過，可以確定的是，世界經濟政治的可能，是必須立基國內經濟政治健全的堅實基礎上，如果一國之內尚未作好，那奢望國際無非是緣木求魚。

七、結論——符合批判觀點的經濟政治

十九世紀英國小說家Dickens，在他的A Tale of Two Cities小說中以辯證的方式描述故事中的時代「是最光明的時代，也是最黑暗的時代」。在二十世紀末的今天，我們也可以用同樣的方式描述這全球一致的資本主義社會。

這確是一個最光明的時代：必須承認資本主義社會所達成的物質成就，它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物質成就，任一個再差的資本主義社會也都不會想回到過去的封建社會。但這也的確是一個最黑暗的時代：以上物質成就僅是少數幾個中心國家，且是以眾多邊陲國家的貧困為代價；而中心國家雖然過

22. S. D. Krasner 對「國際體制」的定義是：在相互依存關係的特定問題領域中，國家間明示或暗示的原則規範和決策程序（1984：2）。但像今天的聯合國與世界貿易組織等國際組織的規範卻多由中心國家掌控，如前一任聯合國秘書長 B. B. Ghali 就因美國堅用否決權而去職。

去道德政治的存有問題已在其經濟政治的龐大結構中找到了暫時的棲身之所，但這也只是將存有意義問題遺忘在聲色犬馬的消費社會中。

人如果僅願意滿足於這種生物性的經濟富足，如某些國家的人只要經濟不要尊嚴，那人就真如 J. P. Sartre (沙特) 所說的人是糞土 (高宣揚，1994：380)，是一種「有機存在」的衣冠禽獸。人不該只想如此吧！而事實上，就是因為「類人」不甘僅是一種「有機存在」，才会有「社會存在」的人產生。

就經濟政治來看，這樣的一種人文念頭，從 Smith 到 Mill 就在資本主義社會失傳了，而由 Marx 以一種辯證批判的方式重新衍續。如何結合這兩個傳統，將這樣的人文念頭化為可行，本文認為，整體性觀點的法律理論是可行的途徑。

這個「整體性法律理論」告訴我們：「因襲主義」與「實用主義」的公共選擇，只是少數有權有勢的人才有權決定，是不足取的，而這樣的公共選擇是有害於政治的，因此，在公眾政治的範疇中必須否認這樣的公共選擇；而我們要肯定的是那個可以在公眾中推己及人的「整體性」觀點，它指出公共選擇必須由全體人民共同決定。

如此，雖然經濟政治之謎可能永遠存在，但我們最終應該有了可以附麗的盼望。

參考書目

Altvater, E., 1993, The Future of the Market. (trans.) by Patrick Camiller. London : Verso.

Amin, S., 1985, Delinking. London: Zed Books.

Anderson, Perry, 1976, Considerations on Western Marxism. London: Verso.

Anderson, Perry , 1992, A Zone of Engagement. London: Verso.

Arrow, K.J., 1963, Social Choice and Individual Values. New York: Wilsy.

- Arrow, K.J., 1971, "Political and Economic Evaluation of Social Effects and Externalities". in Frontiers of Quantitative Economics, M. D. Intrilligator, ed., Amsterdam: North-Holland.
- Bowles, Samuel & Herbert Gintis, 1986, Democracy and Capitalism. Basic Books.
- Braudel, Fernand, 1984, Civilization & Capitalism 15th-18th Century: Vol.3 The Perspective of the World. (trans.) by Sian Reynolds. William Collins Sons & Co Ltd and Harper & Row, Publishers, Inc.
- Buchanan, J.M., 1977, Freedom in Constitution Contract. Texas A&M University Press.
- Campbell, Joseph, 1988, The Power of Myth. with Bill Moyers. New York: Doubleday.
- Chamberlin, E. H., 1962, The Theory of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 Re-orientation of the Theory of Valu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Defoe, Daniel, 1981, Robinson Crusoe. New York: Bantam Books.
- Dickens, Charles, 1949, A Tale of Two Citi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Dworkin, Ronald, 1977, Taking Right Seriousl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Dworkin, Ronald, 1986, Law's Empir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Emmanuel, Arghiri, 1972, Unequal Exchange: A Study of the Imperialism of Trade. (trans.) by Brian Pearce.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 Forster-Carter, A., 1974, "Neo-Marxist Approaches to Development and Undevelopment", in E. de Kadt & G. Williams (eds.) Sociology and Development. London: Tavistock.
- Galbraith, J. K., 1992, The Culture of contentment.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 Grorz, A., 1989, Critique of Economic Reason. (trans.) by G. Handyside and C. Turner. London: Verso.
- Gramsci, A., 1971, Selection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of Antonio Gramsci. (eds.)

- & (trans.) by Q. Hoare and G. N. Smith.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 Havel, V., 1985, 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 Citizens against the State in Central-eastern Europe. (eds.) by John Keane. New York: Palach Press.
- Heilbroner, R. L., 1972, The Worldly Philosophers: the Lives, and Ideas of the Great Economic Thinkers. A Touchstone Book Published by Simon and Schuster.
- Hobhouse, L. T., 1964, Liberal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obson, J. A., 1967, Imperialism: A Study.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 Kant, I., 1929,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trans.) by Norman Kemp Smith. London: Macmillan.
- Kant, I., 1956, 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 (trans.) by Lewis White Beck. The Liberal Arts Press, INC.
- Kennedy, Paul, 1993, Preparing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Random House.
- Keynes, J. M., 1973,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The Collected Writings of John Maynard Kenyes Vol. VII.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Krasner, S. D., 1984, International Regim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Lindblom, C. E., 1977, Politics and Markets: The World's Political Economic Systems. Basic Books.
- Locke, J., 1980, Second Treatise of Government. (eds.) by C. B. Macpherson.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 Malthus, T. R., 1989,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I&II. (eds.) by John Pulle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arcuse, H., 1964, One Dimension Man. Boston: Beacon Press.
- Marshall, Alfred, 1961,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Vol.I&II. London: Macmillan and Company Limited.

- Marx, K. & F. Engels, 1975-95, Karl Marx Frederick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1-47.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 Mill, J. S., 1958, Considerations on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New York: The Liberal Arts Press.
- Mill, J. S., 1965,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with Some of Their Applications to Social Philosophy.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 Montesquieu, 1989, The Spirit of the Law. (trans.) & (eds.) by A. M. Cohler, B. C. Miller, H. S. Ston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organ, L. H., 1964, Ancient Society. (eds.) by L. A. White.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Ophuls, William, 1992, Ecology and the Politics of Scarcity Revisited. New York: W. H. Freeman and Company.
- Oser, Jacob & W. C. Blanchfield, 1976, The Evolution of Economic Thought. New York.
- Pascal, Blaise, 1990, Pensees, in Great Books of the Western World 30 Pascal. (trans.) by W. F. Trotter.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 Polanyi, K., 1957,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Boston: Beacon Press.
- Polanyi, K., 1977, The Livelihood of Man. (eds.) by H. W. Pearson. Academic Press.
- Rawls, J., 1971, A Theory of Justi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Rawls, J., 1993, Political Liberalism.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Redclift, Michael, 1984, Development and the Environmental Crisis: Red or Green Alternative. London: Methuen.
- Ricardo, David, 1912,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 Taxation. London: J. M. Dent & Sons, Ltd.
- Robinson, Joan, 1965, The Economics of Imperfect Competition. London:

Macmillan.

Ruggiero, Guido de, 1967, The History of European Liberalism. (trans.) by R. G. Collingwood. Boston.

Sabine, G. H., 1973, A History of Political Theory. Illinois: Dryden Press.

Schumpeter, J. A., 1994, 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 Routledge.

Sitarz, Daniel (eds.), 1993, Agenda 21: The Earth Summit Strategy to Save Our Planet. Colorado: Earthpress.

Smith, Adam, 1896, Lectures on Justice, Police, Revenue and Arms. (eds.) by Edwin Canna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mith, Adam, 1948, Adam Smith's Mor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eds.) by H. W. Schneider. New York.

Smith, Adam, 1976,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I, II. (eds.) by Edwin Cannan. Chicago.

The Group of Green Economists, 1992, Ecological Economics. London: Zed Books.

Wallerstein, I., 1991, Geopolitics and Geoculture: Essays on the Changing World-Syste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eber, Max, 1976,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trans.) by Talcott Parsons.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Williams, Raymond, 1976, 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戈巴契夫 (M. Gorbachev), 1990, 《改革與新思維》。香港：民主大學出版。

戈巴契夫, 1994, 《未來的社會主義》。中央編譯局國際發展與合作研究所 (編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

日本環境廳, 1990, 《環保小百科》。於幼華 (審定)。台北：台灣英文雜誌社。

瓦特 (Ian P. Watt), 1992, 《小說的興起》。高原、董紅鈞 (譯)。北京：三聯書店。

列寧（Lenin），1972，《列寧選集》共四冊。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

李澤厚，1986，《批判哲學的批判——康德述評》。台北：谷風出版社。

林正義、葉國興、張瑞猛，1990，《台灣加入國際經濟組織策略分析》。台北：國家政策研究資料中心。

柯志明，1986，「伊曼紐·華勒斯坦訪問錄」。台北《當代》，第四期。

高宣揚，1994，《沙特傳》。台北：萬象圖書。

許國賢，1993，《馬克弗森》。台北：東大圖書。

羅志如、范家驥、厲以寧、胡代光，1993，《現代西方經濟學說》上下冊。台北：揚智文化。

羅馬俱樂部（The Club of Rome），1973，《成長的極限》。朱岑樓、胡薇麗（譯）。台北：巨流圖書。

Critique of Economical Politics: From A View of Marxism

Herbert Wang

This paper regards “the enigma of economic politics” as the main question : people can’t get perfect public choices determined by state or by market theoretically, and yet they make public choices constantly practically.

First of all, I explore the extension of enigma between “the Ideal of Economic Politics” from Mill’s thought and “the Reality of Economic Politics” from Marx’s. And then, “the Economic Politics of Political Anthropology” explains that the economy should be subjected to society on the one hand, and the crisis of South-North and ecology force us to face the problems of economic politics on the other hand. After all the explanation does not represent resolution , therefore, we may say there is no desirably political economy in Marxism still. In a dilemma of this enigma, this paper argues that “Dworkin’s theory of law as integrity” can fill up the deficiency of Marxism.

The theory of law as integrity argues that: we should renounce the public choices determined by “conventionalism” or by “pragmatism” because only the privileged classes have the powers to decide the public choices ; in contrast we could demand the public choices determined by “integrity” because all the classes have the rights to determine.

Keywords: Economical Politics; Critique; Political Anthropology; Market; State;
Law as Integrity.